

学林

# 一个留美学生的思想回澜

## ——裘毓麟的《游美见闻录》及其他

■ 裘陈江



▲ 裘毓麟像



▲ 裘毓麟，“巴拿马赛会中国丝绸磁器介绍书”，载《中华实业界》1915年第2卷第9期

1915年巴拿马世博会中国馆全景均资料图片

由于他完全身处当地，且未来持续在此求学，故《见闻录》从到达旧金山开始起，记录了当时当地的风土人情、华侨的历史与现状，巴拿马博览会的参观见闻，均可谓是第一手的现场实录。除此之外，他又利用了当时各国所编专书杂志，故除了在1915—1916年的《大中华》《中华实业界》等杂志直接介绍博览会外，回国后的1919—1921年，他在《江苏实业志》上发表50余篇介绍各国经济、科技的译文，也是当年介绍博览会盛况的延续，其翻译报道的密度和广度可谓少见。

在这些译文中，经济方面除了综述有关进出口贸易的（输入或输出超过之真况）等之外，连续介绍了英国、美国、日本、瑞士、荷兰、墨西哥、坎拿大（加拿大）、澳洲、俄国等国当时的经济发展情况及各自问题。在科技方面，主要介绍了工业革命时期的众多发明家和巨商的生平与成功之道，人物主要集中在英美两国。他的这些译著与所学专业密切相关，而其关怀更在于希望中国能在世界经济大潮中早日摆脱积贫积弱的处境。如《游美见闻录》借巴拿马运河开凿的话头，展望二十世纪的商业的发展方向：

自去岁巴拿马运河落成，为近世商业开一新纪元，其关于太平洋、大西洋两岸诸国影响甚巨。……列强对于吾国之国际关系，必当愈形紧密。

鉴于当时美国和日本在经济上突飞猛进，回顾国内却“金融紧迫，实业凋零，哀鸿遍野，萑苻时虞，民生计，有儼然不可终日之势”，裘氏大为忧虑：

彼（列强）挟其商业政策，国民富力，操刀待割，乘时进取者，固大有人在。循自以往，恐内蚕食之争未已，而他人已入室矣。

他愤而警告：

立国于二十世纪竞争剧烈之场，苟国民于新企业、新工艺之智识，茫无所知，而犹沿中古之诡谲侵略之政策以治美，则吾国未有能倖免者也。

因此，在其著述中还有如《吾国实业不振之原因》等分析种种理由，同时又屡有鼓吹如何提振本国经济的种种

办法，可谓苦口婆心。

其次，展现了民国初年留美学生的心态和生活。裘氏在《游美见闻录》开门见山直陈，国人游历欧美各国，作评论之可采者，亦必以吾国旧说附会之。……洋迷之弊，则适与之相反。洋迷一履西土，无殊登仙，景仰西人，无殊天人。无论西国之礼教陋俗，咸谓为美谈；无论西国鄙夫俗子，咸视为神圣。而语及我国政教风俗，似有深恨宿仇，必丑诋之而后快，一若吾国自皇帝尧舜至今，野蛮已五千年，无丝毫文化之可言者。

他作《见闻录》，虽说“不敢偏于学究，亦不敢偏于洋迷”，但其鉴于“近年以来，国人中洋迷之毒者愈甚”，批评的主要还是“洋迷”问题。

比如裘氏在文章中提醒不可偏听偏信所谓洋经验。他指出“苟欲求世界专业智识，如通外国文者，不如多读西书西报，如不通西文者，亦可译译书译报之佳者读之”。他自以初到美国的亲身经历现身说法，首先指出不可迷信“出洋老前辈”，其言可能反而多不切于实情。其次，如一般盲目推崇外人，称其必定诚实可信，必定慎重人命等定论也必不可全信。此外，在批评“中洋毒”的留学生时，更是辛辣讽刺。他以曾遇到的一位粤籍留学生为例，称其不通中国普通方言，只能操英语相谈，而二人交谈后，更得知其粗通之国语，竟是习自游历中国有年、年老来美的英国人傅兰雅。而他在亲自拜见傅兰雅后更是大受刺激，因为傅氏也感慨：

中国近日之派遣留学生，何漫不选择至之？余亲见多数留学生，中学毫无根底，于中国人情隔膜殊甚，与一未至中国人之外国人无异。即使学成，将使为中国耶？为美国人耶？抑中国政府将为美国代造就国民耶？余不解此辈回国后果有丝毫之裨益于祖国否耶？

而有鉴于当时日本所派留学生的良好效果，裘氏痛惜中国留学界多怪诞离奇之现象，而仍无一定方法宗旨。同

时批评中国留学生“在外时，既无选择去取之辨别，回国后则务以大言吓人，小试不售，即悍然归咎国民程度之不到”。故裘氏主张：“评论欧美之政教风俗，是非优劣，宜各求其实，不可随声附和，一味赞美，致未出国门者闻之，疑鬼疑神，无所适从也。盖制度法令，无绝对之利，亦无绝对之弊，而一国之大，万民之众，散处奇离之风俗，烦复复杂之政教，决不人人贤良，事事优美也。”正是其“不敢偏于学究，亦不敢偏于洋迷”的立场，使得其立论虽也偶有偏激之处，但仍不失务实恳切。

第三，裘氏的著述多集中于回国后不久，此后发表的作品明显减少。又由于裘氏个人资料资料的奇缺，只知道在1921年6月，他已参与了上海华商证券交易所棉花交易所股份有限公司的发起，后成为常务理事之一；同年11月，又参与了大东物券日夜交易所股份有限公司的筹建，后也成为常务理事之一，显然忙于从事经济活动。在此之后或许还是忙于经商，几乎看不到裘氏任何著述，最后一个发表高峰要到三十年代了，而其思想已明显发生了很大的转向。

### 钱基博和唐文治所撰书评序言中的裘毓麟

时至1933年，裘氏在《青鹤》杂志上发表了《匡庐笔记》三篇，其中自道：“近年余喜阅宋明诸儒性理等书。”同时批评“乃一妄人，对于吾国旧有之学术，不惜出全力以抨击之。一若是类书籍，深有害于人群，碍于文化，非绝迹于国内，则决难图改革者”。这当然与其留美期间批评“洋迷”问题有着一贯性，仍主张“吾国当欲免敌人之侵袭者，当先去学术上之奴性”，但其为学的根基，明显已非西学，而归于佛典、宋学等。

裘氏后期的学术，本可以通过其所撰《思辨广录》一书加以了解，但可惜至今难觅原书，或许该书本就未曾刊行。不过幸好可由1935年钱基博和唐文治所撰的书评和序言大致了解，尤其是钱

基博的书评，名为《十年来之国学商兑》，实则便是向学界推荐裘氏的《思辨广录》。文章开头对于裘氏的生平经历作了一些介绍：

先生，名毓麟，匡庐其字，蕙溪人。旧译学馆毕业，升入京师分科大学，以民国二年赴美，留学加利福尼亚大学，习政治经济。五年回国，曾为文著论欧美社会之崇势利而薄仁义，终无以善其后，而不如孔孟之道为可大可久，刊登《时报》。方以新潮澎湃莫之省也，于是闭门读书二十年于兹，精究程朱，旁参释老，积久有得，而著为书。

钱文对于裘氏的治学经历与该书主旨作了大量的摘录与介绍，其摘录裘氏自叙治学之经历，则为“三十以前，年少气锐，事事喜新恶旧”，且“三十岁以前，固为一纯粹学校之学生，彼时所喜研究者，厥惟西儒之科学。吾国圣经贤传，尚不厝意。”而在回国后数年间，“偶得佛经读之，恍然如久处黑暗之中，骤睹光明，奇趣妙理，日出无穷，读之愈久，好之愈笃。……往年余思研国学，欲略知宋儒学之梗概，取《近思录》读之，不能得其精意。”但凭借着“读之愈久，好之愈笃”的求学精神，因而得以撰成《思辨广录》，对于近代以来中西古今学问之争，对于青年修习国学的方法，对于清代学术，对于儒释道三教会通等等重大问题提出自己的见解，得到钱基博超乎寻常的赞赏：“观其所称，见解超卓，议论中正，以聪明人，说老实话。其论不必为近十年发，而近十年之国学商兑，惟先生弹见洽闻，洞见症结，人人所欲言，人人不能言。”（钱基博：《十年来之国学商兑》，《光华大学半月刊》1935年第3卷第9、10期合刊）而唐文治在序言中也称赞裘氏此书“举凡辨章国学，匡救时弊，致广大，尽精微，而会归于有用”，故在文末“深愿以淑人心，扶世道，教中国，救世界之责，属诸于裘君”。（唐文治：《广思辨录序》，《国专月刊》1935年第1卷第4期）

裘毓麟一生治学由西而中，由新而旧，渐渐对于中国旧籍和传统学问有着更多同情和理解。裘氏由译学馆出身，后留学美国，对西方文字、西方制度、西方文化的了解绝非停留于纸面，回国后，随着经历学识见长，却能转入宋学甚至佛典之中，可以看出其思想转变的轨迹，可说是一位学人成熟深思的回归。裘氏能有如此思想转向，在1940年还一度引起晚年吴虞的注意，竺氏在日记中称“裘毓麟为美留生，竺信朱子”，而裘氏的思想转向与吴氏晚年自觉“考订训诂，烦琐无补身心”颇相契合。这种自助自新文化运动以后的思想回澜，也有助于我们反思近代反传统运动的不同面相。

（作者单位：华东师范大学历史学系）

## 李商隐的七夕诗

■ 顾韵

始于汉朝的七夕，是流行于中国及周边诸国的传统节日。牛郎织女的故事脍炙人口，成为中国历代文学创作的一个重要题材。晚唐诗人李商隐写过多首相关作品，其中有一首题为《壬申七夕》：

已驾七香车，心待晓霞。  
风轻惟响珮，日薄不嫣花。  
桂殿传香远，榆高送影斜。  
成都过卜肆，曾妒识灵槎。

前六句写织女与牛郎相会的情景：她驾上香车，满怀憧憬；情人相会时，月桂为他们传递微香，白榆为他们投影蔽，星辰美景中牛郎耳闻织女环珮的鸣响，目睹她如花的容貌。

末两句突然从天上转向人间，“成都过卜肆”用的是汉代严平君的典故，西晋张华《博物志》载，有人八月浮海到了“通玄学”，可见是位博学多才的高人，随着时间的推移他的形象日益高大，在民间传说中从人变成无所不通的半仙，于是有了“识灵槎”的奇说。这样超凡的能力为牛郎织女所妒，因为他们不想让人间知道天上的幽会。

该诗存在一处文字问题，第二句以清人何焯为代表的注家认为应该改为“心待晓霞”——牛郎织女想要避人耳目，“人约黄昏后”显然更为合适。《壬申七夕》尾联突然联系严平君，则出人意外，翻出了新意。就这一技法来说，李商隐的另外一首《七夕偶题》有过之不及：

宝婺银钩，常娥照玉轮。  
灵归天上匹，巧造世间人。  
花朵香千叶，星星盗四邻。  
明朝晒裋鼻，方信阮家贫。

前六句写牛郎织女的相会和千家万户庆祝七夕，情绪颇为欢快。后两句由天上的“灵匹”和周边的邻居突然转向自己的贫穷——和王氏已结婚有年，但仕途蹭蹬，收入很少，情绪也随之低沉下来。和上首一样，尾联用典，阮咸乃“竹林七贤”之一，为人旷达不拘礼法，好酒而贫。据《晋书·阮咸传》记载，七夕当天，阮氏各家按当时风俗都把华丽的衣物拿出来晾晒，唯独阮咸在庭院里挂了一条寒酸破旧的褌裤。褌裤是脏活时用的围裙，一种很不值钱的东西。别人问他何以如此，答曰：“未能免俗，聊复尔耳。”

李商隐七夕诗最有名的还是“此日六军同驻马，当时七夕笑牵牛”（《马嵬二首》其二）这一联。“此日”指唐玄宗奔蜀途中宿于马嵬的那一天，也就是杨贵妃被缢死的日子。“当时七夕”则指天宝十载（751）七月七日，七夕玄宗与杨贵妃在长生殿盟誓世代为夫妇，以为可以永世相守，嗤笑天上牛郎织女一年只能聚会一天。但随着“渔阳鼙鼓动地来”，他们不仅山盟海誓化为泡影，连同在人间都各自归罢了。诗人不但联想到自己爱妻早亡，唯有自己独留人间。牛郎相会一年一次，实在太少，但比起天人永隔的“无期别”却要要好上千万倍。

李商隐早年曾学道，学仙，后来在诗中写过不少这方面的内容，但他从来没有忘记现实世界，他的七夕诗很能说明这一点：无论天上的情形多么如梦如幻、美丽动人，最终他的笔触总还是回到自己、回到人间。

（作者为北京外国语大学国际中国文化研究院教授）

## 回忆斯莱扎克教授

### 柏拉图“未成文学说”的解释学

■ 程炜

德国著名的古典语文学家 and 哲学史家斯莱扎克（Thomas Alexander Szlezák）去世近一年了。作为柏拉图研究领域图根根学派的最后一位代表，他的去世代表着这一学派，甚至半个多世纪以来围绕柏拉图“未成文学说”论战的某种终结。

#### 图根根学派与对话录的“贬值”

斯莱扎克1940年生于布达佩斯，童年随家人移民德国。1969年，他在著名古典学家瓦尔特·伯克特的指导下获得柏林工大古典学博士学位，论文以《仿阿基塔斯论范畴》为题出版（1972）。1990年，他接替康拉德·盖瑟，成为图根根大学古典学希腊语方向的讲席教授。他在此工作一直到2016年退休。意大利西西里的叙拉古市为表彰其柏拉图研究成就，授予他荣誉市民的称号。

斯莱扎克被视为图根根学派“三巨头”之一，这部分出于他在图根根任教的经历，更主要是由他的代表作《柏拉图与哲学的书写性：对早期和中期对话的解释》（1985）所奠定。而他的导读作品《读柏拉图》有二十余种外译本，其畅销也大大拓展了图根根学派的国际影响。

所谓图根根学派的柏拉图解释，核心要义是严肃对待亚里士多德在《物理学》中提及柏拉图“未成文学说”（*agrapha dogmata*, 209b15）的说法，并通过亚

里士多德及一系列古代证言来重构这一没有在柏拉图对话中直接体现的理论。学派奠基者汉斯·克雷默和康拉德·盖瑟一方面根据古代的直接文献——即亚里士多德和古代注解传统中对柏拉图理论的记载——重构柏拉图主义哲学的“内理论”，以“一”和“不定之二”作为本原的形而上学体系；另一方面，他们试图论证这一潜藏在大部分对话背后的理论，优先于对话里的学说断片。按克雷默的说法，这一研究路径不仅恢复了柏拉图系统哲学家的声誉，且建立了从“前苏格拉底”一直到新柏拉图主义哲学的连续性，即对本原的关注和论辩。盖瑟则汇集相关间接文献（“关于柏拉图的证言”），并从宇宙论、历史哲学等方面展示本原理论在柏拉图哲学中的运用。

这一考察柏拉图的方式激起主流学界的激烈反弹，学者们或不承认传统理论的可靠性，或即承认，也反对它们可以凌驾于对话录之上。他们指责这里所谓的本原学说不仅枯燥古旧，更重要的是，图根根学派的理论造成了对话录的“贬值”：它们变成了吸引年轻人进入学园学习所谓真正内理论的劝勉和“广告”，而不再具有哲学核心价值。

在这一背景下，斯莱扎克重新解读柏拉图对话录。他发现，无论是英美分析哲学主导，还是欧陆解释学传统的柏拉图研究，均不加反思地预设了对话录的自足性。这种预设实则是近代以来浪

漫派的柏拉图理解——尤其是施莱尔马赫传统——的后裔。在这一框架下，对话录的一些核心特点或被漠视、误解了。如学者通常将《斐德若》中的书写批判视为柏拉图写作对话录，而非非理论论的核心动机，然而苏格拉底的批判并非对某一类书写的批判，而是针对整个书写或者说书写作为媒介的内在性质。从这一角度看，作为一种书写的对话录并不能置身于这一批判之外。

同样，苏格拉底在辩证交谈中常省略或不愿给出答案——这类情境往往被学者忽略，或视为柏拉图无力解决相关问题的文本证据。斯莱扎克批评这一进路忽略了对话录的文学特征，苏格拉底三缄其口往往是受谈话主题和对话的约束，它们有些可通过诉诸其他对话，有些须诉诸未成文学说才能获得充分理解。

#### 壮志未酬的遗憾

斯莱扎克一开始的学术关注更近亚里士多德，而非柏拉图。七十年代开始，即他来到苏黎世大学转向新柏拉图主义研究时，才真正严肃对待并亲近克雷默和盖瑟的理论。鉴于图根根学派的“异端性”，导师伯克特曾警告斯莱扎克发表对柏拉图学说的研究可能危及他的职业前景。但斯莱扎克不为所动，相比于未来的饭碗，他更关心一种有前景的柏拉图解释方法。

斯莱扎克在研究和组织上硕果累累，但其实也有壮志未酬的遗憾，主要涉及对柏拉图档案馆（Tübinger Platon-Archiv）的领导。该档案馆建立于1970年，意在接续格奥尔格·皮希特在四十年代的工作，对柏拉图的用词作系统彻底的归类整理，出版类似《早期希腊语辞典》（1955—2010）这样的大型工具书。档案馆成立不久，馆长盖瑟放弃编订辞典的计划，将工作重心转到收集柏拉图文献和推进柏拉图传统的研究上。八十年代，他组织了《柏拉图文献补遗：间接的柏拉图文

纪念



第599期

文汇报  
学人